



当代俄罗斯语言学理论译库
北京市科技创新平台项目
俄罗斯叶利钦基金会资助项目

总主编 刘利民 主编 杜桂枝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овое о ег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м,
лексическом и смысловом строе

Н.Ю.Шведова

俄语新论： 语法·词汇·意义（下）

〔俄〕Н.Ю.什维多娃 著
宁琦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овое о ег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м,
лексическом и смысловом строе

俄语新论： 语法·词汇·意义（下）

〔俄〕Н.Ю.什维多娃 著
宁琦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1-19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语新论:语法·词汇·意义(下)/(俄)Н.Ю.什维多娃(Shvedova N.Y.)著;宁琦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当代俄罗斯语言学理论译库)

ISBN 978-7-301-18742-5

I. 俄... II. ①什... ②宁... III. 俄语—研究 IV. H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5904号

Н.Ю.ШВЕДО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овое о ег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м, лексическом и смысловом строе)

© Н.Ю.Шведова, 2005

©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5

书 名: 俄语新论:语法·词汇·意义(下)

著作责任者:[俄]Н. Ю.什维多娃 著 宁 琦 译

组稿编辑:张 冰

责任编辑:李 哲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742-5/H·279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

印 刷 者:河北滦县鑫华书刊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5.25印张 410千字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总 序

俄语语言学理论研究在世界语言学中一直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从18世纪的罗蒙诺索夫到20世纪的维诺格拉多夫,从历史悠久的喀山学派到著名的莫斯科语义学派,俄罗斯产生和培养了一批批颇有影响的语言学家。他们一代代传承着语言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以敏锐和细腻的语言感悟,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研究方法,在斯拉夫语言的沃土上开垦和耕耘,建立起许多独特的语言学理论,收获着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将俄罗斯语言学的发展变化置于世界语言学的大视野中做个粗略比照,便不难发现,在世界语言学发展的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每当有新的思潮和范式涌现,俄罗斯语言学界都会同期出现伟大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学理论,譬如,与索绪尔站在同一时代语言学制高点上的博杜恩·库尔特内;可与乔姆斯基“转换生成模式”并肩的梅里丘克的“意义 $\leftrightarrow$ 文本”语言学模式;20世纪80至90年代,当西方语言学界在为乔治·莱考夫的以解释学为中心的认知语言学新范式欢呼雀跃时,解释学方法早在1974年出版的俄罗斯语言学家阿普列相的《词汇语义学》中便得到了详细的论述和应用,这一方法在俄国的许多语言学家,譬如博古斯拉夫斯基、什梅廖夫、沙图诺夫斯基等的语义学研究中都已广泛应用与发展;进入21世纪,帕杜切娃进行的“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研究震撼和颠覆了传统语义学理念,她进而提出的“动态语义学”理论更是让人耳目一新。由此,可以不夸张地说,俄语语言学理论研究一直是与世界语言学的发展律动保持着同一节拍的,在个别时期或个别领域有时候甚至是领先一步。当代许多著名的俄罗斯语言学家的思想都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和前沿性,俄语语言学理论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中极具价值且尚待努力开掘的一方富矿。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语言学界对俄罗斯语言学的发展历史和目前的理论水准缺少应有的关注,对俄罗斯语言学取得的成就了解得较少,致使俄罗斯语言学领域中的许多重要理论和先进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播。中国语言学界并没有真正地全面了解和学习到俄罗斯语言学理论研究的精华,未能在实质上分享到俄语学先进理论的成果。

中国当代俄语语言学理论研究真正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在改革开放和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虽然目前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但与我国的

西方语言学研究相比,俄语语言学理论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本源性和宏观整体性,许多语言学理论的引介或者通过第三种语言翻译过来,或通过二次评介传入,致使俄罗斯语言学理论研究显得支离破碎,或者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究其根源,就是在我国的俄语语言学理论研究中缺乏系统、宏观的本源性、整合性研究,而理论研究的缺失与偏误必然会影响和阻滞整个学科的进步和可持续性发展。

如此局面的形成,作为俄语工作者的我们深切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愧疚,同时还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全面了解俄罗斯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和现状,把握其精髓,必须对俄罗斯语言学理论宝藏做本源性的开掘,必须对语言学理论的精品做系统的直接译介和潜心研究,让人类文化的这一块宝贵财富不仅能够哺育圣·西里尔的后人,也为中国的语言学者所共享,也为丰富中华语言和文化发挥作用。

基于这样的理念和目标,杜桂枝教授主持申报了北京市科技创新平台项目,精选了九位当代俄罗斯语言学著名学者的理论代表作,邀集了国内俄语界相关领域理论研究造诣较深的学者,担纲翻译及研究工作。毋庸置疑,这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巨大工程。

我们说,这项工程是一个创新性的大胆尝试,因为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自中国开办俄语教育300余年以来,虽然有过个别的俄语语言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引介,但如此大规模地、系统地、有组织地进行翻译和研究,在我国的俄语教育史上尚属首次。

我们说,这项工程是一种可贵的无私奉献,因为在当今的学术氛围下,在当今的评价体系中,每个人都清楚,学术著作的翻译几乎不具学术“价值”,甚至是一些人回避不及的“辛苦”。然而,我们邀请到的每一位学者都欣然地接受了这份几近无酬又“不增分”的“低性价比”的“纠结和折磨”:缘于一份浓郁的俄语情结,期待的是自身理论的升华和自我价值的超越,为的是先进的前沿性俄语语言学理论的传播。

我们说,这项工程是一份默默耕耘的艰辛劳作,因为这九位俄罗斯语言学家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顶级学者,这些代表作中的每一部几乎都是作者倾其一生的研究成果之集成。没有对该学者的深入了解,没有对其多年研究脉络和方法的把握,没有对其理论、概念和相关术语的理解和领悟,要想完成这一翻译任务是根本无望的,译者在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其中的付出不言而喻。

我们说,这项工程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综合项目,因为这一工程涉及语言

学的各个领域: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词汇学、语言哲学、语言的逻辑分析、逻辑语义、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等。面对语言学理论林林总总的学科,站在语言学前沿理论的高端上,体验着俄罗斯语言学家的思维脉动,感受着学者们思想的敏锐和理论的深邃,这无疑是对语言学大千世界的一次鸟瞰,此时此刻无人敢言内行。因此,在制定翻译计划和领受翻译任务时,我们有约在先:每一位翻译者应对所翻译著作全文负责,力争使自己成为各自领域中的专家、内行。

简言之,这是一项有责任、有分量、有难度的大工程。有人说,翻译是一门艺术。其实,学术著作的翻译更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在走进艺术殿堂的行程中,要经历崎岖与荆棘,需要努力跋涉,要不断地克服困难,不停顿地向着目标艰难攀登,才有可能摘取艺术的皇冠。也曾有人形象地比喻:翻译是“带着镣铐起舞”。如果说一般语言翻译的镣铐尚是“舞者”可以承受之重的话,那么,学术理论著作翻译的镣铐对译者的考验、束缚更让“舞者”举步维艰,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未必能展示出优美的舞姿。所幸,中国的俄语界有这样一批知难而进的学者,他们不畏惧这副沉重的镣铐,心甘情愿地披挂在身,欣然前行。当我们亲历了艰难起舞的全过程,当一本本沉甸甸的译稿摆上案头,我们会释然地说,无论舞姿是否优美,我们尽心,也尽力了。

当我们即将把这样一套理论译著奉献给读者时,心中仍存一份忐忑:毕竟这是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的理论代表作,毕竟民族间语言与文化差异的存在、某些术语的无法完全等译,会给译文留下些许的遗憾,难免会有不够精准的理解、表述和疏漏之处。在此,真诚地欢迎语言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提出意见,同时也真诚地希望给“带着镣铐的舞者”们多些宽容和鼓励。

再谈一些技术性问题。

1. 我们所选的九位俄罗斯语言学家代表着语言学不同的方向和领域,各自都有独特的研究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语言表述风格。因此,我们不力求每部作品在形式、风格乃至术语上都一致,而是给予译者相对的独立性,以此保证每一部译著的完整性、统一性和独特性。我们希望读者在不同的译著中,除了能读出原作者的风范外,还能品读到译者的风格。

2. 对于国外学者译名的处理问题,我们采用了如下原则:①对在我国语言学界早已耳熟能详的世界著名学者,沿用现有的译名,如索绪尔、乔姆斯基等;②对西方的语言学家、哲学家等,采用国内学界已有的译名,尽量接轨;③对俄罗斯及斯拉夫语系的学者,我们按照国内通行的译名手册的标准翻译,同时兼

顾已有的习惯译法。

3. 关于术语在上下文、前后章节中的使用问题,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在准确把握原文意图的前提下尽量一致,前后统一,减少歧义;同时又要考虑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的使用情况做灵活处理,术语的译文以保证意义准确为宗旨,以准确诠释学术理论思想为前提,随文本意义变化而变,因语境不同而异。

4. 为保持原著的面貌和风格,在形式上遵循和沿用原著各自的行文体例,没有强求形式上的统一,因此,即便是在同一本译作中,也会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5. 鉴于篇幅问题,个别著作的中译版分为上、下卷出版。

最后,由衷地感谢北京市教委,为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大平台,使诸多俄语学者实现了为俄语学界、为我国语言学界做一点贡献的愿望。

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俄罗斯叶利钦基金会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本套译库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

唯愿我们的努力能为我国的俄语教学与研究,为我国语言学的整体发展产生助推和添薪作用。

总主编 刘利民

2010年12月

作者简介

1916年生于莫斯科。1935年毕业于莫斯科中等翻译技术学院(后更名为外国语学院)英语部。1935年至1936年在莫斯科中央电报局担任翻译校对员。1940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俄语语言文学专业。1940年至1944年曾在摩尔多瓦教师学院及摩尔多瓦国立师范学院(战时——在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捷姆尼科夫市)担任讲师。1946年研究生毕业后,在维诺格拉多夫院士的指导下通过题为《俄语长尾形容词述谓语用法的产生与发展》副博士论文答辩。正是从这时起开始了在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不同时期曾与语言研究所有分有和)的工作。1958年通过了题为《俄语口语句法学。简单句的结构》博士论文答辩。60年代和70年代,一连数个学期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讲授“俄语句法学”理论教程并主持讨论课。1964年被授予教授称号。1984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97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在俄语研究所曾先后担任初级科学研究员、高级科学研究员并(从1961至1989年)担任俄语标准语史研究室(1970年改组为俄语标准语历史与语法研究室,1986年又改为现代俄语语法与词汇学研究部)负责人。从1966年起历时15年担任隶属国际斯拉夫学者委员会的国际语法委员会委员。

发表170多篇有关俄语标准语史、语法学、词汇学、词典学、词理论、俄语学科史等方面问题的学术成果。在最近四十年间(1964年奥热果夫去世后)一直从事单卷本《俄语词典》的编写工作(第9版至23版的编辑和增补),并于1990年作为该词典的合作者被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授予普希金奖章。从1991年起单卷本俄语词典作为两个作者——奥热果夫和什维多娃——的著作出版发行(《俄语详解词典》1—4版,1991—1997年)。目前担任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顾问并主持重大科研项目《从语法和词汇体系、语法和词汇语义、篇章规律相互作用角度出发的俄语结构—功能描写》。

我的学术观点的形成和对语言科学任务的理解首先要归功于维克多·弗拉基米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院士以及整个祖国经典语言学传统。

H. Ю. 什维多娃

作者的话

本书收录的是作者最近四十年来发表的学术成果,主要涉及俄语语法(首先是句法)问题、词汇问题、语法和词汇的相互作用、词典学、语言意义和涵义、信息类型学。当然,把这些研究成果(连同其他没有纳入本书的研究成果)集成一部章节前后紧密相联系的学术专著也是可以的。但是,首先,这将需要大量的时间,而笔者的时间已所剩不多。第二,这一点,可能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在我看来,读者也许会有兴趣直接“沉浸于”那些年代,那时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激烈的辩论,当时提出的很多结论都曾引起过反对和争论;关于句子聚合体系及其形式和正规体现问题、关于全句限定语问题、关于句子语义结构问题、关于语言指示系统问题、关于信息类型学问题等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面对本书的内容、某些文章和所选的研究课题时,读者就会变成语言学辩论的参与者,直接地,去亲自比较各种不同的观点,发现各种不同观点和结论的令人信服的方面和薄弱的方面。

从另一个方面看,了解收录于此、涉及俄语语言学各种不同问题的不同年代的研究成果可以使读者信服,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是用统一的研究方法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这一方法可以简短地用“从形式到意义的方法”来表达,无条件地接受和主张有关形式本身始终是有意义的论点以及最微小的形式差异也总是伴随着哪怕是个别的、有时是难以察觉的意义差异的论点。这个源于祖国语言学经典传统的论点曾经遭遇到(而且,遗憾的是,至今仍然遭到)激烈的,有时甚至是具有攻击性的反对者,他们在大量肤浅的文章里以“从意义到不知所终”的论点与“从形式到意义”的论点相对抗。

在这本书里,在其全部章节中,读者将追随研究者的道路——作为绝对最早参与构建这些或那些语言意义的研究者认为形式和意义不可分割并致力于认清形式的本质。同时,笔者严格遵循有关语言符号不对称二元论的经典论点以及据此论点在研究材料过程中得出的全部结论。读者会发现,无论是在涉及语法、还是涉及词汇学和词典学的著作中,还是在专门探讨口语特殊结构的章节里,还是在词的语义结构问题、词典学的现实理论问题的解决中,作者都始终如一地遵循着这一科学方法。

研究作为自然系统的语言的词汇组成,描写(在多卷本集体成果——《俄语

语义词典》中)该系统的所有方面——考虑到其形式、结构特征的各种类别——使笔者得出在这个系统内部存在完全确定和闭合的、本身带有指示功能的词的类别的重要结论。语言指示系统作为双部形式化的词汇“小系统”,是贯穿语言所有层次并形成语言意义体系的普遍语言意义载体。对语言指示系统的详细描述明确了语言意义是一个形式化范畴的定义。在此得出的成果自然而然成为探索表意词典——这是一部之中所描写单位是存在和体现在严格限定的语言意义系统中的某些语义总和、综合体的词典——新构想的原因。

很显然,这本书中无法反映多年来我每天都在从事的单卷本俄语词典编写工作,这项工作在担任词典责任编辑的奥热果夫去世之后(1964)马上开始,并在历时近四十年对它的词条进行补充和深化之后,最终形成了两个作者的合作成果——《俄语详解词典》(1—4版,1992—2001)。这部词典的容量几乎增加了一倍,集词及其形式使用的规范化任务与词的语义结构、词的意义系统描写于一身,这种描写符合它们的现实状态并且反映当前已经发生和正在继续发生的词汇学方面的变化。

多年从事编辑一系列论文集和其他研究者的学术专著的工作也占用了我许多时间和劳动,同时作为作者还参与和编辑了大量的集体创作,首先是1970年的语法、1980年的两卷本科学院语法、1989年的语法和多卷本《俄语语义词典》(1—3卷,1998—2003于莫斯科出版,尚有后续出版)。对所有这些工作我都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和责任感来完成的,是它给予了我机会,使我不仅能够同著名的学者,而且能够同年轻的研究者——我的学生们一道工作。

尽管我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仍然认为我的学术命运是幸福的,并对所有与我同行在这条道路上的人怀有深深的感激。

目 录

句法中的词

作为18—19世纪俄语标准语句法发展史研究问题之一的词汇限制问题	1
从18—19世纪俄语标准语中的性质二格的历史谈起 (论句法中的词汇限制问题)	9
俄语口语中作为句子语法意义成素的感叹词	35
论俄语对话言语研究:重复一语句	46
关于词组系统中的分析结构(由核心词操控的搭配)	71
用于词的句法联系的词的范畴特性	88

语言的词汇系统·词·词在词典中的描写

论包含于词中的积极潜能	102
建构词的多角度描写的上下文类型	110
作为俄语词汇系统主导的动词	119
俄语动词的词汇分类(以捷克语义—成分分类法为背景)	124
词汇系统及其在详解词典中的反映(人称代词的类别)	138
词条的矛盾现象	148
《俄语语义词典》研究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	153
作者还是编者?(关于词典学家的责任)	169

语言指示系统·语言意义

代词与意义(俄语代词类别及其所揭示的意义空间)	173
第一部分 作为语言意义结构基础的代词系统	175
第二部分 初始代词、它们的微系统及其意义潜能	209
结语	281

句法中的词

作为18—19世纪俄语标准语句法 发展史研究问题之一的词汇限制问题

1. 对新时期标准语句法体系历史的研究包含着—系列与俄语语法体系发展的总体特点和速度相关的特殊困难。对该研究任务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它可以是传统上提出的对单个结构或者一组结构的历史的研究。但是,在给自己提出目标要在较短且接近当下的时间里研究清楚结构的历史之后,研究者常常面对句法结构本身缺少某些变化的事实,当然,这是以非常缓慢的语法体系变化为条件的。因此,对单独选取的范畴的历史进行研究的传统方法,作为个别和独立的对象,在此并不适用。尝试研究处于相对固定(但不稳定)的句法和语义相互关系之中的整个结构组的发展变化将是一个更加合理、并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方法。这将是一个重建相互关系发展史,重建语义在使用上、存在环境中和相关句法现象修辞色彩方面变迁的历史过程的尝试。在此展现出广阔的研究视野。相互关系系统比结构形式本身更加容易变化。这些系统本质上就应该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它们正是处在经常变化和发展之中的历史句法现实。

2. 但是如果这个或那个句法结构形式在最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过外部变化,那么是否意味着,在过去的时间里它没有任何内在的演变过程,内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样的结论未免是片面的和不可信的。问题在于,除了形式本身的变化之外(当它们存在时),除了与其他结构类型的联系和相互关系方面的变化之外,在使用上、存在环境中、在句法结构的变化过程中经常发生内在的结构功能条件的变化,即句法结构和能够填充该结构的词汇材料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些关系在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常常在整体上对模型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众所周知,许多词组、单部句、谓语类型都受到自身词汇填充能力方面的限制。这不是指那些与言语内容、词的意义组合的不可能性相关的限制,词的意义组合的不可能性是直接以现实组合的不可能性为前提的。作为结构因素之一的词汇限制,本质上作为结构的独特标志,具有其他纯语言的根源和原因,而

且揭示这些原因是一项特殊的任务,这一任务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专门的追根溯源之后才能得以完成。

句法中的词汇限制并非一种。一方面,整个能够参与这个或那个结构构成的词的范围可能是受限的,即本身包括一个数量有限的词汇系列。比如,那种由无人称动词本身(вечереет, рассвело等)构成的无人称句类型的词汇限制特点就是如此。能够填充这种结构的词的组成方面的变化,在此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属于结构本身的发展过程,而只属于词的相应范围的发展过程。因此,19世纪俄语标准语特有的由人称动词系列向无人称动词类的转变与相应的句法结构发展过程没有关系;比较:«День светает» (Крылов, Лиса); «День уже вечерел» (Лажечников, Последний Новик); «Твой вечереет век» (Батюшков, Тибуллова элегия); «Вечереет жизни день» (Ф. Глинка, Судьба Наполеона); «Уж день прохладно вечерел» (Жуковский, Суд в подземелье); «Сердце вечереет» (Вяземский, Ты светлая звезда); 还有: «Нам молодость везет» (Грибоедов, Кто брат, кто сестра); «Счастье везет» (Некрасов); «Смеркается много звезд» (Помяловский, Молотов)等。

另一方面,更为常见的,确属一定结构类型的词的范围本身并没有狭隘的界限;然而远不是所有这样的词都可以用于构成这一结构。此种类型词汇限制的例子有无人称句,其主要成分由名词第一格与动词不定式的组合表示。进入名词范畴的词实际上不可计数;但是可以参与构成上面这类无人称句的只有几十个抽象名词,它们具有最概括的、客观上已知或主观上暴露出来的状态语义或可能性和必要性语义(Сейчас не место и не время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ть; Не дело тебе здесь оставаться; Велика вещь возить или пахать!; Написать «Выжигина» не штука; Ей не след выходить замуж; Срам смотреть; Просить для меня нож; Твоя воля их принять или не принять; Грех тебе будет не заехать等)¹。正是这种特殊用法使有理由将这些名词,特别是经常用于这类结构的名词(охота, грех, лень, пора, время等)中的一部分划入——尽管在我们看来论据不够充分——“状态范畴”。其他例子还有由代词что和仅有的几个抽象语义名词或范围狭窄的性质形容词二格组合构成的无人称句(Что пользы по свету таскаться!; Что общего меж нами!; Что мне лестного быть членом:

1 当代读者觉得特别的例子都摘自18—19世纪作家的不同作品(参见《Из истории родительного квалитативного в русск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языке XVIII — XIX вв.》一文中的作者名单)。

клуба!; Что прибыли любить!))。

3. 对不同句法模型填充起作用的词汇语义限制从历史发展上看是不断变化的。这些变化中体现着结构的内部演变过程。重要的是要特别指出,这些变化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该结构与其它结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这些相互关系的变化和词汇限制的变化常常构成统一的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例如,带有含系词*есть*的名词性谓语的双部句(*Театр есть училище нравов; Жизнь долго есть терять милы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处在与同义的无系词结构的积极相互关系之中,而在18末和19世纪,尤其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与带有新的或已然活跃起来的系词*вот, это, значит, это значит, это есть, является*的结构处于积极的相互关系之中。无系词结构和带新系词的结构是明显占上风的范畴;带*есть*和*суть*的结构则急剧缩减。但是这远非单纯的数量缩减。如果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带系词*есть*和*суть*的谓语还可以用语义截然不同的名词表示——既可以是抽象名词(*Вероятность не есть доказанная истина*),也可以是具体名词(*Граф есть внук бывшего датского министра*),还可以是专有名词(*Автор пьесы есть господин Бульи*),那么19世纪下半叶以及再晚些时候,这一结构的组成中几乎只留下抽象语义名词。随着时间向当代的推移,这一趋势得到持续发展并且变得越发明确。因此结构使用的缩减往往带来结构词汇填充可能性方面的限制。

总的来说,在19世纪俄语标准语词汇语义限制的变动中可以捕捉到一个总的趋势,这一趋势或可归结为词汇填充可能性的进一步缩小(在已有限制之处),或可归结为在先前结构具有任意或不加限定的广泛词汇填充之处开始出现词汇语义限制。所谓性质二格的发展沿革情况可以作为一个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趋势的例子。

18世纪——19世纪上半叶的俄语标准语中由名词二格与不可切分的一致关系词的组合构成的词组无论是在定语、还是在谓语的使用方面都发挥过积极作用。虽然这样的组合也曾曾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来自名词方面的词汇限制,但是它们构造的可能性仍然相当广阔:它们之中可包括与类别、范畴、组别概念有关的词(*какого сорта, низшего разряда, разного разбора, обоего пола, лифляндской породы, не нашей нации*),与尺度概念有关的词(*равной толщины, разного веса, крошечного роста*),与年龄、颜色、外部或内部特征、属性、性能概念相关的词(*особливого сложения, устройства, красивого лица, недурной наружности,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й красоты, отменного сложения,*

хорошего свойства, благородных качеств, разных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与智力和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概念相关的词(иного мнения, тех же идей, таких мыслей, буй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темперамента, недалекого ума, простого обхождения, сурового нрава), 与时期概念有关的词(не нашего века, двенадцатого века), 与动作概念相关的词(его сочинения, своего засола, моего печенья), 以及一系列由材料(черного дерева, красного сукна)或地点概念(нашего уезда, полка, здешней семинарии, обители)统合起来的表示具体一事物意义的词等。一部分这样的组合与其他形式的组合没有功能—语义上的相关性, 另外一些则具有这样的相关性。与语法相关性的改变、其它类型组合取代二格形式组合的过程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是带有性质二格的结构词汇填充可能性的缩减过程。整个19世纪, 相对局部意义、区分意义和具体一事物意义的词在这些词组组成中的使用急剧减少。

这一趋势得以持续下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十分明显是因为, 与其他词组没有相互关系并因此稳定地保留下来的词组的基本组成正是由普遍概括意义、非具体一事物意义的名词参与构成的(比较: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й величины, какого роста, первого сорта, высшего разряда, лучшего качества, скольких лет, какого цвета等)。这样一来, 接近19世纪末期时已经完全消失或使用急剧减少的词组有带有具体动作意义的动名词(根据相应的动词)的词组, 之中的一致关系词由物主形式承担(фарс Гетева сочинения; дом твоего построения; пироги ее печенья; цветы нашего сажанья; картины его рисования); 带有表示具体特征并在构词上与相应的形容词相关的名词的组合(человек сердечной доброты, примерной аккуратности, увлекательной любезности, решительной неустрашимости, необычайной понятливости, беспримерного высокомерия); 带有指称具体特点和外部特征的名词的词组(офицер сурового лица; девка немецкой талии; старушка набожной физиономии; блондин греческого профиля; мужчина изящных форм); 带有具体一事物意义名词、与带前置词с的第五格形式的组合(рудники удобного металла; платье модного узора; стихи доктилического окончания)和带前置词из(стаканы моего буфета; фрукты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оранжерей)的二格形式的组合等类似的词组。这些变化的结果就是将带有千篇一律、不断重复的词汇填充形式的二格词组在语言中固定下来; 这些词组里继续加入不同语义(参见上文)的名词, 但是它们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其意义是概括的、似乎是非区分性的——这

与带有狭窄、确定和表示具体一事物意义的词相反。

在相关形式发展的影响下,结构的词汇界限缩小的另一个例子便是无系词的第五格谓语类型,它在19世纪遭受了连续不断的词汇限制并以其使用仅以非常狭窄的词汇填充可能性为条件的形式保留到现在。在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初,无系词第五格名词谓语类型的使用比19世纪末、尤其是比现代俄语中要广泛得多。这一结构的使用以下列词汇限制为前提。常用的结构有:1)带有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причина, вина, препона, порука, залог, пример, утешение, наказание 等抽象名词的结构(Самые те права препною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Причиной богатства его тайная связь; Пребывание ваше в Перербурге для меня ясным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м того, что...; Ваши правила для меня порукою вашей твердости; А мне так песни утешеньем на старости моей; Это право в его руках слепым орудием прихоти; Жизнь ему казнью);2)带有表示主体(通常是人)的时间状态、用途、功能、外表和行为方面特征的词的结构:Я уже три дня свидетелем ее добронравия; Я снова на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затворником; Но это ли честолюбие надежным вожатым на пути почестей?; Не думай, что я побудителем ее ревности; Я здесь твоим проводником; Зачинщиком ли он нового у нас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языка?; Что это вы франтом таким?;3)带有称名工种、职业和职位的词的结构:Он советником посольства; Самый тот, который ныне у нас портным; Послом там г-н Булгаков; Как все переменилось ныне во Франции! Дессен капралом! Дессен в мундире!; Все лучшие люди в городе членами клуба; Директором вод Новосельцев.

众所周知,在所研究时期中第五格谓语类型与第一格谓语类型积极地相互作用。对于无系词结构来说,第五格受限和第一格谓语在第一格无系词类型普遍活跃的影响下明显占据优势这一点得到证实,这是由于带有 есть, суть 的系词结构的弱化以及非常大量的使用第一格谓语类型的情况完全没有与第五格相关的用法。在19世纪无系词第五格谓语类型,在总体数量降低的同时,使用方面呈现出结构词汇填充可能性的进一步缩减。这种减少表现如下:1)在第一组(带有抽象意义)词中, причина, вина, порука 等词的使用稳定地保存下来,比其他使用过的并变成功能个性化词形的词更为常用;2)为表达时间状态、功能、外表和行为,只有几个词保留下来第五格形式的固定使用: он молодцом, франтом, щеголем; он свидетелем;3)表示工种、活动时只在称名本身职务、职位的地方保留下来第五格(Она здесь учительницей; Я тут комиссионером

винокурного завода)。因此,无系词的第五格谓语类型在19世纪末实际上是个句法范畴,不仅从自身词汇填充可能性角度看是不自由的,而且所受限制达到实质上只是涉及个别几个允许这种句法使用的词的程度。正是和这些词一起,该种词汇填充中,仍在使用的无系词第五格谓语形式,并从当初能产的句法样板变成词汇闭合的特殊性质结构。无系词第五格谓语形式的命运,与我们前面所研究的带有二格的组合的命运一样,是结构功能化的内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明显例子,这些变化可以导致相应结构本身的形式性质的变化。

4. 19世纪俄语标准语的不同句法结构发展历史中出现各种不同的词汇限制变化过程。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过程表现为在保留所有参与这个或那个结构的词的语义组的条件下缩减发生在这些组别内部,即进入更加广阔的语义范围的这个或那个词汇—语义序列的词失去了成为该句法样板组成中的结构要素的能力。这样一来,例如,在带有性质二格的组合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能够进入这些组合的、表示外部特征或外貌特征的词语义组已经缩减,靠削减表示外貌、面貌的个别具体特征的词。其他情况下限制表现在能够在某个结构组成中发挥功能作用的词的语义组本身数量在减少。当整个抽象语义词组(一些具体的词形除外)实际上已经丧失进入相应句子类型的能力时,前面对其特征已经进行过简要描述的无系词第五格谓语形式的发展沿革(情况)可以用作这类缩减的例子。有时已经脱离过去语言状态的限制,在我们面前以形成不可分割的组合告终。因此,现在使用的делать что-нибудь из-под палки起源于19世纪初还十分活跃的、带有前置词из-под的词组类型,表示“来自强制性措施的行为结果”:делать что-нибудь из-под страха, из-под побоев(参见沃斯托科夫,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在其他情况下可以说在语言中保留下来的只是曾经活跃的句法结构的个别词汇残余。在这方面18—19世纪标准语中副动词的谓语功能的发展沿革(情况)是很典型的。我们知道,这一时期这种功能已经是残存的功能且使用极其有限。然而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叙事散文、记叙文中(而在私人书信里还要更晚)表示状态的副动词谓语,如果没有规范记录下来的话,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例外:Много снега напавши; Площадь вся заросши лесом, «Лед весьма был стеснившись» (Мордвинов, Записки); Церковь вся осевши в землю; Мы были приставши в трактире; Флот был забежавши в Унскую губу (Челище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северу России); Бабушка была нагнувшись (Болотов, Жизнь и приключения...); Нос и уши побелевши и распухши (Измайлов, Евгений); Итальянец был спрятавшись (Зотов, Замок Сен-Жермен); Рожи у Григория и Ивана вдруг становятся